

学科与流派

西方应用人类学百年发展回顾

董建辉 石奕龙

提 要 本文叙述了西方应用人类学的形成时期、发展初期、扩展时期和决策时期 4 个阶段,回顾了西方应用人类学从 19 世纪末至今百余年的发展历程。文章认为,西方应用人类学的百年发展,经历了从为殖民统治效力到为民族国家服务的转变,其内容也从较单纯的应用实践,发展到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在内的综合性研究;我国在人类学学科建设中,应该借鉴西方应用人类学发展的经验教训,开展本土化的应用人类学研究。

关键词 应用人类学 发展 西方国家

中图分类号 C91

应用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致力于把人类学在研究人类社会文化过程中所积累的知识和研究成果,运用于改变人类社会生活不如意的地方,以促进人类社会朝着健康、进步的方向发展。同时,它也从事相关的理论研究。在人类学领域中,应用人类学是发展最迅速的分支学科之一。在西方,目前从事应用人类学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他们参与社会规划与决策,处理和解决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改善现存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和卫生等条件,促成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并使人类学关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理想付诸于具体的行动与实践。自从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形成以来,西方应用人类学走过了百年发展历程,经历了 4 个阶段:形成时期(? ~ 1914)、发展初期(1915 ~ 1938)、扩展时期(1939 ~ 1970)和决策时期(1971 ~ 至今)。

一、应用人类学的形成(? ~ 1914)

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学学科体系的形成,是与殖民主义在全球的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由于殖民统治者需要了解殖民地社会的人民与文化,并处理与原住民之间的矛盾冲突,才使得对异民族社会文化的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学学科体系的形成过程就是

人类学应用于为殖民统治服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随着人类学应用实践的积累,人类学的应用思想应运而生,应用人类学的名称也开始出现,作为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的应用人类学开始形成。

19 世纪,欧洲殖民主义大肆扩张,迫切需要有关殖民地部落的民族及其文化的知识。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早期的人类学者主要为殖民者提供有关原住民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知识,或者帮助培训殖民地官员,以避免殖民者因为对殖民地社会的无知而造成与原住民之间的对抗和冲突。例如在 1864 年,荷兰人将民族学课程列入殖民地公务员的培训计划;1905 年,南非联邦要求在殖民地官员的培训计划中设置民族学课程;1908 年,英属埃及也实行了类似的计划。美国人类学家斯库克拉夫特(H. R. Schoolcraft)则于 1852 ~ 1857 年间收集了大量印第安人的资料,汇集为 6 册出版,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印第安人的政策服务。也有一些人类学家直接受雇于政府,从事对原住民的政策研究。如 1881 年左右成立的美国民族学事务局,其主要职能就是为联邦政府从事有关印第

石奕龙,1996,第 36 页。

van Willigen,1993,p. 19.

安人的政策研究。这些应用性实践在为殖民统治服务的同时,客观上也起到了减缓殖民者与原住民之间矛盾的作用。

当然,也有少数人类学者出于学术良知,从事原住民权益的保护活动,以促进人们对原住民的关心。例如在 1838 年,伦敦成立了原住民保护学会,为原住民谋求利益。摩尔根(L. H. Morgan)于 1843 年成立了“大易洛魁社”,其“宗旨在于促进美国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感情,并协助印第安人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作为塞纳卡印第安人(Seneca)部落的辩护律师,摩尔根曾经向企图侵占塞纳卡人居住地的白人地产公司提起诉讼,使塞纳卡人的权益得到保障。又如邓肯(W. Duncan)曾在北美印第安人中间从事传教与辩护工作,对当地原住民的文化变迁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为这一地区的社会变革作出了贡献。

在大量应用性实践的基础上,有些人类学者明确提出了人类学的应用思想。19 世纪 80 年代,人类学家泰勒(E. Tylor)提出,人类学是一门革新者的科学,也是一门决策的科学,应该把它应用于治理殖民地和改善人类的生活条件上。1901 年,伦敦成立了“非洲协会”,提出“了解非洲人而治理非洲人”的口号和宗旨。1899~1902 年南非战争结束之际,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曾写信给当时负责殖民地事务的英国大臣,建议把南非各民族的法律和习惯记录下来,以便为将来制定有关殖民地的政策奠定基础。法国社会学年鉴派大师莫斯(M. Mauss)也于 1913 年发表了“民族学在法国与国外”一文,呼吁重视人类学应用研究,以便为将来法国的殖民地政策提供学科依据。

因为有了人类学应用的大量实践,归纳概括这种实践的名称也应运而生。1896 年,美国人类学家布林顿(D. Brinton)在就任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时,发表了题为“人类学的目标”的演讲,首次使用应用人类学(applied anthropology)一词来指称人类学的应用实践。虽然此后还出现过其他名称,如实践人类学(practical anthropology)、行动中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in action)、行动人类学(action anthropology)、人类工程学(anthropological engineering)、发展人类学(development anthropology)等等,但“应用人类学”这一名称由于具有较广的涵盖面和概括性而被人类学界普遍接受,成为限

定和指称人类学应用实践与研究的专有名称。

二、应用人类学的发展初期(1915~1938)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主义体系开始动摇,殖民统治由直接统治走向间接统治,其下层行政事务主要由当地原住民首领来承担。这时,应用人类学家不仅继续对殖民地官员进行培训,而且也开始了对原住民首领的训练,以帮助他们了解西方文化,加强与殖民地官员之间的沟通。例如,拉德克利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于 1916~1918 年在汤加任皇家学院院长时,就曾从事过原住民的教育改造工作,以使其适应当时的西方文化和政策,减少因文化矛盾而造成的冲突。

这一时期,殖民地社会已经发生一定的文化变迁,应用人类学家对此给予了关注。例如,“非洲语言与文化国际协会”(现称“国际非洲协会”)成立于 1926 年,其宗旨是促进对非洲的人类学和语言学研究。但是,为了减缓舶来品同非洲传统习惯和心理之间的冲突,“促进一个健康的、进步的和有组织的社会向前发展”,该协会于 1932 年开始扩大研究范围,着手研究非洲社会组织 and 外来统治制度之间的关系、教育与宗教的关系、学校教育对传统价值观的影响、雇佣劳动制的社会后果等。(迈尔,1985)应用人类学对于殖民地社会文化变迁的关注,有助于缓解文化变迁所带来的种种压力,避免了殖民地社会不必要的失调和离析,同时也为将来进一步研究文化变迁的机制、模式和结果等奠定了基础。

随着人们对应用人类学的作用的认识加深,一些私营企业和机构也开始雇用人类学家去帮助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例如在 1927~1932 年,芝加哥西方电气公司的霍桑工厂就聘请了一些人类学家,运用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法研究工厂中的人群互动关系,了解工人之间的关系模式,进而寻求解决工厂中人际关系症结的方法,以便提

摩尔根,1997,《古代社会》,杨东莼等译,第 1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泰勒著,连树声译,2005,《原始文化》,第 756 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亦园,1980,“人类学的应用”,载于《文化人类学选读》,第 446 页,台湾:食货出版社。

高劳动生产率。类似的活动也促进了工业人类学(industry anthropology)的形成与发展。

在其发展初期,应用人类学主要还是为殖民统治服务,充当殖民统治的工具。虽然很多人类学家都坚称,他们在政治上持中立的立场,但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工作在客观上给原住民带来了巨大痛苦。例如在美国,部分人类学者曾经与印第安人事务局合作,执行同化政策,致使印第安人对此付出了惨重代价。应用人类学家在殖民政权下的这种角色以及他们与原住民的关系后来受到激烈的批评,同时也引起了人类学家的自我反省,从而激发他们追求新的研究目标。

三、应用人类学的扩展时期(1939~1970)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许多人类学家被迫卷入了战争,从事与战争有关的各种工作,从而使当时的应用人类学研究带有浓厚的战争色彩。例如在美国,有的人类学家在美国的“战时再安置局”工作,负责监管“重新安置营”中的日裔美国人,并研究如何在战后重新安置这些问题。有的人类学家则担任政府顾问,帮助训练赴国外作战的军人、情报人员和战后驻各国的外交人员。还有的人类学家受雇于美国战时情报局,为军事、外交和情报人员编写《各国情况指南》,介绍和说明各国文化习俗,并从事旨在了解日本、德国等敌国军心士气的“国民性”研究,参与制定占领区的治理政策等等。有的人类学家则进行美国战时食品供应的研究,探讨在食品短缺时如何改变公众的饮食习惯,以及对美国向欧洲国家提供食品援助的态度进行评估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殖民主义体系土崩瓦解,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随着前殖民地国家民族意识和主权意识的增长,人类学家一度被视为殖民主义的帮凶,被禁止到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田野研究。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家纷纷将目光转向国内,开始对本国社会中那些被社会上层所忽视和压制的少数民族和下层群体进行研究,研究的主题包括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发展对今后社会的冲击、民族特性、主流社会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环境影响、都市病态、贫穷文化、福利政策等。他们认为,本国社会中的这些弱势群体虽然也是公共政策或计划所关心的对象,但他们极少有机

会对涉及他们的政策或计划表达自己的意见,因此需要人类学者充当他们的代言人和辩护者。

在美国,因为战后成为新的世界霸主,太平洋地区成为其托管地,所以许多人类学家都受聘从事托管地的行政管理工作和应用研究。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提供贯彻政府政策和执行发展规划的方法,向托管地人民宣传和解释政府有关健康、劳动、教育、法律和司法程序的政策与规划,并对政府推行规划的实施情况作出评估。应用人类学的这种研究方式被称为行政管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由于政策和规划都是由政府制定的,人类学家的工作主要是结合实际提供信息、咨询和建议,对决策的影响力有限,有时还难免会受到决策层的抵制,所以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特别是当委托人或决策者误解或误用人类学家的信息时,人类学家更是束手无策。

对由政府或机构所主导的社会变革效果的严重关切,导致应用人类学发展出另一种研究模式——辩护—行动模式。按照这种模式的工作要求,人类学家不能满足于充当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和辩护者,而是要让被研究对象主动参与决定他们命运的社会变革,因为他们比决策者和研究者更清楚他们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为此,人类学家应该具备研究社会文化变迁和促进社区发展的双重目标,通过积极参与和介入将要发生变迁的社区的事务,引导研究对象按照人类学家和当事人共同预设的目标,逐步使社区发生社会变迁,从而造福于该社区的广大民众。康奈尔大学人类学系所主持的维柯斯计划(Vicos project)就是一个指导社区变迁的成功案例。它积极介入所研究社区的社会变迁的态度,使得应用人类学在价值中立的研究策略之外,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价值介入的研究策略。

另一方面,新独立的殖民地国家也有自己的问题,如政治独立后,要用什么样的现代手段管理

Chapple, Eliot D., 1953, *Applied Anthropology in Industry*, in Kroeber A. L. (ed.), *Anthropology Toda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819~831.

H. G. Barnett, 1956, *Anthropology in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H. F. Dobyns et al., 1971, *Peasants, Power and Applied Social Change*, CA: Sage Publications.

国家;经济如何起飞;如何逐步实现现代化等等。与此相关的是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人口控制、公共卫生的改善、文化教育的发展、社会发展、乡民社会的都市化等各种社会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段时间,人类学家大多致力于人类学知识在社会发展中的应用,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其充当殖民主义帮凶的形象也随之得到部分改善。于是,一些人类学家又开始以为国际机构的开发计划服务的名义,重返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并从事各种社会问题的研究,旨在帮助第三世界国家改良生产技术,提高生活水准,改变社区状况,促成有计划的变迁。例如,刘易斯(O. Lewis)就曾在墨西哥的城市贫民窟从事“贫穷文化”(culture of poverty)的研究,以寻求解决都市平民贫穷问题的对策。

与此同时,第三世界国家也逐渐有了自己的应用人类学家。他们在西方接受人类学的系统教育,回到自己的国家后,积极介入本国、本民族的社会文化变革,制定各种应用人类学研究计划。例如墨西哥于60年代实施了一系列社会变革计划,这些计划大都是在墨西哥本国人类学家的主持和参与下实施的。

四、应用人类学的决策时期(1971~至今)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应用人类学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就目前的发展来看,可以说几乎涵盖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随着应用人类学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应用人类学家的角色和职能也趋于多样化。首先,由于人类学学术机构人满为患,许多人类学者成为职业应用人类学家。以美国为例,20世纪70年代,2/3的人类学博士毕业后没有留在学术界,而是选择在政府、公司、基金会、旅游机构等部门工作,成为职业应用人类学者。80年代,攻读人类学博士的人数锐减,但仍有1/3的人毕业后到学术界之外的各种机构工作。其次,在应用人类学领域,出现了医学人类学、教育人类学、发展人类学、都市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等较小的分支学科。这些新的分支学科都非常强调实践和多学科的合作,而与过去纯理论研究的人类学训练有所不同。

最大的变化是所谓“新应用人类学”的出现,它注重学术圈外不同层次、不同场合的政策研究,

利用人类学知识帮助决策者制定和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的社会效益。其主要工作包括:收集资料,整理和提供与决策相关的系统情报;提出可供选择的各种方案,以供决策者择优选用;从理论上说明与政策有关的价值观念;帮助解决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评估政策的社会效应,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使有效的政策得以持续,不恰当的政策得以纠正。应用人类学家提出,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一个阶段性过程,它不仅受到各种特殊利益集团之间对抗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制定和执行政策的各层次机构和个人的影响,为了更有效地参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人类学者应该从政策的适当性、社会代价和效应以及公众参与的程度等方面进行政策分析,从而使决策更具科学性和客观性。

西方应用人类学对政策研究的重视,主要源自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7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者到各种机构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成为该领域的决策者,从而使他们有机会参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为以后从事政策研究积累了第一手资料;其次,人类学者从人类学应用的历史实践中认识到,要想使人类学真正起到指导社会和文化变迁的作用,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是从事描述、评价等方面的工作,而是要积极参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避免决策者扭曲地应用人类学家的研究。而且,参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可以把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控制在政策制定阶段。正是由于对政策研究的重视,所以人们将70年代以后的应用人类学研究称为“决策时期”。

近年来,人类学者发现,他们与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群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难以处理了。对此,基础人类学的回应是改变观念。他们把民族志视为研究自己文化的一种机制,它不再只是代表“被研究者”,而是成为看待自己文化的一种方法,是对自己文化的一种“文化批评”。与此相反,应用

Lewis, Oscar, 1959, *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D'Andrade, R. G. et al., 1975, Academic Opportunity in Anthropology, 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77 (4), pp. 753 ~ 773.

马尔库斯和费彻尔著,王铭铭等译,1998,《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人类学家则以积极合作或参与的方式与被研究者一起工作,与被研究者共同分享有关的知识,把社区的目标和人类学的目标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在实践中,应用人类学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应用模式,相应地,应用人类学家的角色也出现了细微的差异。在行动研究与合作方法的应用模式中,应用人类学家充当的是指导社区的辅助性角色;而在文化经纪人的应用模式中,应用人类学家则扮演着文化媒介的角色。尽管如此,他们都强调与被研究者的平等关系,并创立了“合文化”(coculture)这一术语来强调这种平等关系。应用人类学与基础人类学所运用的方式虽然不同,但它们都有助于克服以往的人类学研究将研究对象单纯视为被关注的目标的弊端。

西方应用人类学的百年发展,经历了从为殖民统治效力到为民族国家服务的转变,其内容也从较单纯的应用实践发展到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在内的综合性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应用人类学的研究模式从行政管理模式转向辩护—行动模式,再转变为直接参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其社会价值观也从价值中立转向价值中立与价值介入并存,并逐渐形成了为西方应用人类学家所共同遵守的职业道德,其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在我国,虽然应用人类学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学者提倡,并在40年代有了初步发展,但由于50年代后人类学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学科而遭到否定,应用人类学研究亦随之中断。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人类学研究开始复苏,应用人类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进展,但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现实需求相比,仍有比较大的差距。在新的世纪,我们应该在借鉴西方应用人类学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社会生活和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开展本土化的应用人类学研究。

参考文献:

1. 辛格尔顿,1984,《应用人类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 迈尔,1985,“应用人类学”,载于《民族译丛》,第3期。
3. 石奕龙,1996,《应用人类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4. 谢剑,1989,《应用人类学》,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5. 爱德华·泰勒,2005,《原始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6. 韦恩·沃里,1993,“实践的应用人类学”,载于《中国人类学学会通讯》,第175期。
7.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1997,《The 1997 ~ 1998 AAA Guide》,Arlington, VA: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8. Baba, Marietta L. & Hill, Carole E. (eds.), 1997, 《The Global Practice of Anthropology》, Williamsburg, VA: Studies in Third World Societies.
9. Chambers, Erve, 1985, 《Applied Anthropology: A Practical Guide》, Englewood: Prentice-Hall.
10. Eddy, Elizabeth M. & Partridge, William L. (eds.), 1987, 《Applied Anthropology in Americ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1. Foster, George M., 1969, 《Applied Anthropology》,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2. Podolefsky, Aaron & Brown, Peter J., 1997, 《Applying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 Introductory Reader》, Mountain View, CA: Mayfield Publishing.
13. Society for Applied Anthropology, 1978, 《Practicing Anthropology: A Career-Oriented Publication for the Society for Applied Anthropology》, College Park, MD: Society for Applied Anthropology.
14. van Willigen John, 1991, 《Anthropology in Use: A Source Book on Anthropological Practic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5. van Willigen, John, 1993, 《Applied Anthropology: An Introduction》, Westport: Bergin & Garvey.
16. van Willigen, John, 1996, Applied Anthropology, in 《Encyclopedia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in Levinson, David and Emer, Melvin (eds.), New York: Henry Hotland Company, Inc.
17. Wulff, Robert M. & Fiske, Shirley J. (eds.), 1987, 《Anthropological Praxis: Translating Knowledge Into Ac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本文作者:董建辉,男,1966年生,博士,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石奕龙,男,1952年生,硕士,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361005)

(责任编辑:胡图)

van Willigen, 1996, pp. 72 ~ 73.